

论全球发展倡议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 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刘 艳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广州 510665)

[摘 要] 全球发展倡议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创造性回答全球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怎么办”等元问题的全球发展元理论。源于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探索,全球发展倡议遵循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立足于世界历史时代现实,直面 21 世纪全球发展的整体性困境,以胸怀天下的大历史观大局观,系统性解决了全球发展的宗旨、原则、动力、路径等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构建了将全球发展作为有机整体的新框架,开创了基于平等合作全球伙伴关系的新范式,构筑了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当代形态。全球发展倡议改变了全球发展的无序状态,使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主体性力量,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进程。

[关键词] 全球发展倡议; 世界历史理论; 西方中心主义; 元理论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3-0001-0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66}这一论述为我们从人类历史整体视角理解和把握全球发展倡议及其作为世界历史理论的意义与价值提供了时空坐标。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历史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发展困境凸显。一方面,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破产,全球北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引擎作用衰退,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义在欧美主流政治中兴起,全球合作的多边主义遭受冲击和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建设开创的

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新型全球化重塑了全球社会对现代文明以及文明走向的认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变,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没有变。变乱交织的世界,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和新挑战。发展问题成为“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症结所在。人类社会呼吁社会主义理论引领全球发展,建立一种令世界范围内的穷人普遍受益的全球发展范式。2021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起的全球发展倡议,就是对全球发展时代性世界性需求做出的元理论回应,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全球发展难题的破解之道。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 世纪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其政治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1BZZ019)。

[收稿日期] 2026-02-10

[作者简介] 刘 艳,女,吉林辽源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一、全球发展困境与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

全球发展是世界各国以《联合国宪章》为工作框架,以其全球合作承诺为基础,共同应对贫困、不平等和其他全球挑战,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共同繁荣的过程。全球发展困境是指世界各国以可持续和公平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全球发展目标时出现的复杂挑战和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

(一)发展偏离国际议程核心与全球发展困境整体性表征

以全球化为载体的世界历史时代的突出特征是全球性问题涌现。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仅联合国推动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难以实现,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制也遭受严峻挑战,发展已严重偏离了国际议程的核心。

首先,联合国推动的全球发展目标难以实现。自1961年确立第1个发展十年(1961—1970)以来,联合国发起和推动全球发展经历了4个10年发展计划、1个15年的“千年发展目标(2000—2015)”和当前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2030)”。全球发展议程启动之初,联合国就将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帮助发展中国家人民摆脱贫困作为宗旨。毫无疑问,联合国推动的全球发展,在减贫、教育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全球南方系统性不发达的境况并未改变,全球北方与南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加大了,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无法实现的挑战。联合国《2023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认为“从2015年到2019年,世界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这已经远远不足以实现目标”,还指出“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都严重偏离了轨道”^[2]。

全球发展更严峻挑战来自美国右翼政治下单边主义肆虐及其对国际合作多边机制的破坏。以右翼民粹主义为选民基础的特朗普政府承诺“美国优先”,将全球化作为美国及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恶果的替罪羊,推行逆全球化政策。两个任期期间,特朗普政府相继退

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多边机制,减少及重新调整了对外援助举措,不仅使联合国承受了运作和财政压力,还削弱了全球合作应对贫困、饥饿、健康生活和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挑战的能力,阻碍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其次,全球发展困境的整体性表征与人民性指向。全球发展困境表征为全球南方被债务危机剥夺了发展的可能性。1970年代以来,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全球北方和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加剧。自2010年以来,全球南方的公共债务增长速度是北方国家的两倍。2021年南方国家支付了4000亿美元来偿还债务,是其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金额的两倍多^[3]。也就是说,大多数南方国家借钱不是为了投资于本国发展,而是为了偿还债券持有人。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反殖民运动领导人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ílcar Cabral)一针见血地指出,南方国家正面对一个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要么与国际资产阶级为伍,以保持新殖民主义结构完整,但背叛革命;要么改变这些结构,为人民利益服务,与人民最深层次的渴望达成一致^[4]。

全球发展困境在全球北方则是表现为排斥性增长危机。1980年代开始,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全球北方通过市场化、私有化和减少国家干预的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但这是一种无法惠及普通民众的排斥性增长。例如美国,被视为美国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家庭持续萎缩,占比从1971年的61%缩减至2021年的50%,其中2014年曾降至43%^[5]。资本主义两极悖论显著,贫富差距加剧了政治和社会不平等,造成了“落后地区”和边缘化人口环境^[6]。边缘化民众认为其遭受了经济剥夺,被国家和政治精英抛弃,这加速了社会极化与右翼民粹主义政治进程。

全球发展整体性困境需解决的是人民性指向,即发展“为了谁”的元问题。

(二)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及其元理论框架

全球发展困境本质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和

西方式现代化陷入困境。2008 年金融危机后,印度学者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都呼吁,人类社会需要一个控制不平等、促进全球发展的新框架^[7]。新冠疫情全球流行更加突显了当代全球的多危机特征。面对全人类共同的公共卫生威胁,资本主义的自利性使“南北信任破裂”。在全球发展更加不平等和环境更加复杂的关键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起了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的主要内容是“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8]471}。全球发展倡议不是针对全球发展某一特定领域的具体学说或理论,而是着眼世界历史时代,将全球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对其构成要素、主导理念、目标宗旨、路径原则等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进行系统性厘清与界定的元理论。

首先,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及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质态跃升的观点,强调科技的驱动作用和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主张全球发展目标是发展优先、动力是创新驱动,着力解决全球发展思想方向和价值取向问题。实践路径是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各国经济政策协同增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

其次,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主张全球发展宗旨是以人民为中心、原则是普惠包容,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公平、不平衡的问题。实践路径是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发展环境,构建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多边发展,携手实现跨越发展。

最后,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和实践观,强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主张全球发展模式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路径是行动导向,着力解决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实践路径是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加大发展资源投入,推进减贫、发展筹资和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完善全球环境治理。

全球发展倡议以天下观和系统思维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和还原论思维,打破了诸如“西方/东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二元思维的限制,将各个国家都放到全球网络之中,强调它们是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平等关系。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方法论。

二、全球发展倡议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

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提供了一个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的元理论框架,“六个坚持”形成了内在贯通、有机统一的逻辑体系,确立了全球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原则、理论框架和实践范式,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

(一)全球发展宗旨:以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超越西方抽象的先验理性人权观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发展宗旨,解决了全球发展“为了谁”的元问题,从而为全球发展动力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前提。全球发展的西方中心主义延续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理性主义世界观和进步观,尤其是黑格尔宣称的“‘理性’统治了世界,也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9]23},认为全球发展动力来自人类普遍的理性和人权等精神因素,全球发展目标是西方式现代化。但是,“现实的人”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发展中并不“在场”。将全球发展主体从抽象的“理性”回归到“人民”,既是全球发展倡议对全球发展元叙事正本清源式的重构,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本体论的超越。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没有抽象的人、人性和人类社会,它们都必然表现为特定关系和实践中现实的、具体的人和人性。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发展的最高本质和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世界历史的发展通向

共产主义,亦即人由“物的依赖性”向人的“自由个性”发展,通向自由的开始,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习近平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8]161}全球发展倡议强调作为集体人权的发展权和作为个体人权的发展权的统一,主张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球发展倡议从根本上打破和改变了“西方在过去四百年间发展起来的文明间关系的模式”^{[10]158},重塑了人类社会进步的人民标准,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改善人民福祉,是衡量发展和进步的标准。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人类社会进步中物质条件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地位,提出全球发展目标是发展优先、动力是创新驱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1]158}习近平进一步强调物质基础对人类文明延续和发展的优先性、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指出“经济发展是文明存续的有力支撑,繁荣富强是国家进步的重要基石”^{[12]467}。全球发展倡议主张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核心地位、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强调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全球发展倡议打破和超越了西方价值观普遍主义对全球发展主体和动力的框定和制约,确立全球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和理论框架。

(二)全球发展主体关系:协和万邦的天下观超越西方文明优越的等级观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普惠包容的全球发展原则,解决了全球发展“依靠谁”的元问题,为确立全球南方在全球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支撑。殖民体系瓦解

后,西方国家仍以文明优越者自居,制造了基于种族、历史和文化的当代等级观,炮制了所谓“独立但不平等”原则。这种殖民主义逻辑认为全球南方天生依赖北方国家及其援助,不具备独立发展的能力,因此在经济与政治地位上永远无法与全球北方平等。

在西方殖民主义逻辑主导下,全球北方和南方形成了“施舍—依附”全球发展模式。二战后,美国及北方国家主导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构和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官方援助机制,由此形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与联合国、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1980年代后,这些机构通过官方援助等“合法化”途径将市场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融入联合国推动的全球发展目标的设定和实践中。全球北方不仅掠夺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通过债务、不公平贸易从全球南方获取巨额利润,还将其经济增长利益凌驾于全球南方社会福祉和环境保护之上,破坏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社会和环境目标)落实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斯威士兰经济人类学家杰森·克尔(Jason Hickel)指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系统性的剥削,全球南方处于不发达状态,为全球北方的增长服务^{[13]3}。

全球发展倡议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与发展,着力解决全球发展中的各民族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不公平的问题,提出了普惠包容的全球发展原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施舍—依附”慈善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现实基础是世界历史格局变化,使全球南方国家成为全球发展的应然主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1]404}资本主义首创了世界历史,因生产、消费和社会交往使世界连成一体,同时也确立了资本世界扩张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剥削制度。全球北方主导下的全球发展,企图使南方国家永久地沦为其附

庸。然而,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洞察了世界历史格局转变对历史走向的决定性意义:“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其中,“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和斗争”是世界历史格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14]667}。

全球发展倡议首创了基于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的全球发展新范式,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继承与发展。以胸怀天下的大历史观和全局观,全球发展新范式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东西阵营之别、北南主从之分的狭隘利益和群体范畴,实现了世界历史时代全球发展应然主体和实然主体的统一。全球发展倡议把握人类历史演进的深层次需求,主张构建新型全球伙伴关系,这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互相尊重、平等信任、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资本主义完成了将世界连成一体任务,而社会主义将完成世界应该如何连接的问题。全球伙伴关系“新”在平等、互利、和平、包容,通过多边发展主体之间合作,实现共赢的协同范式。普惠包容原则体现了全球发展由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参与建设、平等分享成果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和发展观,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排斥性增长的超越。

(三)全球发展路径:以世界文明多中心的多元现代性超越欧洲中心一元现代性普遍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主旨在于从现实状况出发,改造现实和构建现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从世界文明多中心的历史出发,主张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以多元现代性超越欧洲中心一元现代性普遍主义,解决了全球发展“怎么办”的元问题。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践指向是自主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探索,打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西方现代化框架。维持西方中心主义的长期话语是否认南方国

家自主发展的权利和能力。例如,对于东亚国家创造的当代发展奇迹,美国学者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认为:“亚洲国家取得成就,是由于它们进入世界经济,而不是由于内在的、自主的发展。”^{[15]306}此类言论与事实完全相悖。亚洲国家崛起正是根据自身国情实际自主发展的结果,是多元现代性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16]9}自主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基于自身文明特色和发展需求的现代化模式,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和现代化观。它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世界历史是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尊重并维护世界各国根据国情实际选择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路径的权利。

其次,多元现代性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另一重超越在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探索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环境悖论,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认识论上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只是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物质为人类服务的活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17]239}人和自然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认识论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是以挥霍性消费为条件的。资本逻辑已经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而是通过对自然资源进行不加节制的掠夺来扩张消费、保证经济增长。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平衡无法兼顾的环境悖论。

全球发展倡议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逻辑,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7]169}人类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克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跃升至生态文明唯一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8]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模式下的全球发展是通过全球绿色转型，秉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尊重并落实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权利，通过绿色可持续发展，根除贫穷、落后等系统性不发达状况，推动全球共同繁荣和实现人类文明形态的跃升。

三、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的世界历史意义

全球发展倡议直面现代化和全球化引擎从全球北方向全球南方“空间变换”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把握世界历史演进规律，从目标宗旨、动能转换和范式转变上解决了全球发展战略偏离、创新停滞、增长乏力、对抗加剧的时代性世界性难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全球的展开和持续性的发展拓展了空间。

（一）全球发展倡议校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全球发展倡议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实践为基础的、遵循现代化共性规律的、普适性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也是指导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引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世界历史理论。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进程、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校准了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19]5}从现代化视角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否定了西方中心主义及其理论支柱“东方停滞”说和“欧洲独特”说，实现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扬弃与超越，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昭示了世界历史的演进方向必然是共产主义。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

形态超越并取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人类社会发展是辩证的历史进步的过程，内部蕴含螺旋式、跨越性的运行状态，其历史逻辑是：“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11]204}。中国式现代化承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超越了资本主义以物为本的资本逻辑，代之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本逻辑。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3}共同富裕使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极悖论，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开辟了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使资本主义“既被克服又被保存”，使人类社会具备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核心和最基础的要素和条件。资本主义的最终归宿是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11]70}。

全球发展倡议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现代性强制同质化逻辑、“资本逻辑”和发展悖论，确立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范式，引领人类文明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迈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

（二）全球发展倡议推动了“国际社会”向“全球社会”转变

全球发展倡议打破并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确立的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支配/从属”的权力关系，推动人类社会从“国际社会”向“全球社会”转变。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相继形成了“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全球社会”是指基于对“全球问题”的共识和解决“全球问题”的共同努力而形成的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共同体和个人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体系^[21]。“国际社会”是由英国学派提出的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概念，是指“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某些共同利益和

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即它们认为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并且一起确保共同制度的运行”^{[22]15}。英国学派认为国际社会由西方国家互动形成,全球南方国家只能是一个被动进入和“被社会化”的过程,进而否定了全球南方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全球发展倡议实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全球发展新框架和新范式是引领和推动人类从“国际社会”转向“全球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路径。当代全球性问题涌现威胁人类社会发展与安全。美国推行极端利己的“美国优先”政策,加速了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进程,联合国推动的多边主义遭受冲击和挫折。全球发展倡议维护联合国在推动全球发展中的地位,肯定其在指导、协调和推动全球发展、促进国际合作和共同繁荣的最重要的多边机制和核心作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发展优先、行动导向,通过全球发展新框架和新范式推动全球发展朝着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和自主(自由)的方向发展,从而超越共同体与共同体、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实现人类社会永久和平和人类文明永续发展。因此,全球发展倡议促使人类社会在国际观念基础上树立全球观念,在国家意识基础上树立人类意识,推进人类社会从“国际社会”向“全球社会”转变。

四、结语

总之,全球发展倡议以破解全球发展难题为导向,以胸怀天下的大历史观和全局观,坚持系统思维,一揽子解决了全球发展元问题,创立了全球发展元理论。以“六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发展新框架和以全球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全球发展新范式,既是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当代形态,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首先,全球发展倡议宣告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是冠以任何名义的“中心主义”退出人类历史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

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23]196}西方中心主义以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发展悖论及其对待发展走向的“历史终结论”否定了人类整体进步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阻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全球发展倡议依据世界历史结构变化实际,主张并维护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南方国家的主体性是改变现实、创造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个单独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1]166}。通过构建全球发展新框架和新范式,全球发展倡议确立了世界历史时代人类社会超越资本主义和整体进步的必然逻辑和实现路径。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跃升。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和经济关系异化等发展悖论决定了共产主义不仅是崇高的价值追求,还是消除资本主义异化关系、实现人的解放及其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运动。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这一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23]196}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历史时代人类发展的实践方式提供了“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全球发展倡议就是这一“证明”在全球的开展与拓展。全球发展新框架和新范式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的、与世界历史时代“人的存在”状况相适应的全球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全球发展宗旨重塑了全球发展元叙事和元理论,提供了以“以人为本”定义全球发展正义、权利、平等和社会进步的新范式,开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

- 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EB/OL]. (2023-09-13) [2025-12-28]. <https://sdgs.un.org/gedr/gedr2023>.
- [3] UNCTAD. Debt crisis: Developing countries' external debt hits record \$ 11.4 trillion [EB/OL]. (2025-03-17) [2026-01-08]. <https://unctad.org/news/debt-crisis-developing-countries-external-debt-hits-record-114-trillion>.
- [4] Nzongola - Ntalaja. Amílcar Cabral and the theory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struggle [J].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11, No. 2, Unity and Struggle: Reassessing the Thought of Amílcar Cabral, 1984 (Spring): 43-54.
- [5] KOOP Avery. US household income distribution data, shown in one chart. [EB/OL]. (2022-07-13) [2025-12-28]. <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2022/07/household-income-distribution-wealth-inequality-united-states/>.
- [6] PUTZEL James. The "Populist" right challenge to neoliberalism: Social policy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20 (2): 418-441.
- [7] PIKETTY Thomas. The economics of inequality [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2015.
- [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9] 黑格尔. 历史哲学 [M]. 王造时,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 [10] 埃里克·沃格林. 政治观念史稿 卷五: 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 [M]. 霍伟岸,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13] HICKEL Jason. The divide: Global inequality from conquest to free markets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8.
- [1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5] 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作用 [M]. 程克雄,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 [1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 [1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 [19]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21] 叶险明. 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6): 4-23+205.
- [22] 赫德利·布尔. 无政府社会: 世界政治秩序研究 [M]. 张小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2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光 翟)

体用论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三重维度*

郭慧慧¹ 陆永胜²

(1.东南大学中华文化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96;
2.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6)

[摘 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人民性的特质。体用论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包含“体”和“用”的双重内涵。其“体”具有人民为主体、民心为标尺、民生为导向的理论内涵;由“体”涵摄的“用”呈现为以文新民、以文富民、以文惠民三个向度的实践要求。“体”“用”各有所指,又相互贯通,既传承了中国传统体用论的智慧,又在新的应用场域中生发新意,揭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立足现实的人、关注人的发展、重视人的解放的人学旨向。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体用辩证法,有助于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立场的理论观点与实践布局的内在一致性,进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在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 体用论; 人民性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3-0009-08

2023 年 10 月 8 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1] 其中,“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概括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品格。“体”“用”原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对范畴和叙事标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既继承了中国传统体用论的思想精髓,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全新的文化语境中,“明体”关联“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强调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用”连缀“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致用的实践属性;“体用贯通”强调“体”“用”的和合,讲求“体”中有“用”、“用”中有“体”,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观与方法论、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统一。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内容丰富的体系,其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实践部署上的安排在多重维度上共时并存,必须要从纷繁复杂中把握其主要的、本质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意蕴研究”(项目编号: SCJJ24ZD11),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课题“长江文化脉络梳理和时代价值阐释研究”(项目标号:25WYB-004)。

[收稿日期] 2025-10-20

[作者简介] 郭慧慧,女,河南驻马店人,东南大学中华文化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陆永胜,男,河南南阳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11}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人民性”是始终贯穿其中的“根本”,既是理论基点也是实践原点,内在地包含异于传统的“体”和“用”的双重认知结构,构筑了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意涵的重要切入点。

一、立民为体: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主体立场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特征在形而上的理论层面上呈现为以人民为主体、以民心为标尺、以民生为导向的三重维度。以人民为主体坚持了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以民心为标尺、以民生为导向体现了“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的为政之道。民生与民心相连,民心与国运相关。“人民”“民心”“民生”三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共同构筑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体”之内涵。

(一)人民:文化创造和传承的主体

人民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类存在物,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162}。作为主体的人在有意识地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与对象化的客体交互,在主体客体化的演化中将自身的本质力量、自我目的和内在尺度投射到客体上,与客体的规律性和客观尺度结合,从而建构出文化的世界。相对于普遍意义的“人”,“人民”是一个承载阶级意涵的政治概念,唯物史观坚持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包含着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的维度,从主体层面揭示了历史逻辑与文化逻辑相统一的文化发展行程。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并多次指出:“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3]4}这实则以高度的理论清醒和思想自觉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和文化创造主体地位的尊重与肯定。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拥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接续中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推动文明进步,以文化发

展的事实再现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历史不会停滞,中国人民的文化创造实践也不会停止。在历史的接续中,伴随着中国人民主体意识的不断强化、主体力量的持续发挥,必将推动创造更加丰富的文化样态,厚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根基。

人民是文化发展和传承的主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人在历史更替中的作用:“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540}这里谈及的“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就包括文化。人们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利用这些现成的“材料”,继续从事先辈实践的包括文化传承、更新、再造在内的实践活动。同时,由于人是一个没有完成而且不可能完成的存在物^{[4]233}——他永远向未来敞开着大门,现在没有、将来也永不会有完成的人,表现为静态在场的人和动态生成性的人的统一,具有“生生”的内在逻辑。因而,包括文化的传承、更新和再造在内的文化实践活动也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恒久性。在人类世代更替中,当下在场的人会成为过去,未来的人会成为当下在场的人,由在场的主体和生成性的主体之间存在的张力而引发的文化的现在性与存在性之间的矛盾,构筑了文化发展和传承的“生生”的动力。就此而言,中国人民是中华文化世代传承赓续的主体载体和动力。

(二)民心:文化工作布局的标尺

“民心”自古以来是中国政治、国家治理的核心命题之一^[5]。中国传统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民心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对民心及其内蕴的情感力量的重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将民心与天心、天命画上等号,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统治者对民众的重视程度,但在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传统的民心政治在根本上是统治者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异于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是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新时代,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和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政权稳固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传统的民心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创造性地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6]60}的论断,以“现实的人”的“人心”超越了传统抽象的“天心”,纠偏了传统民心政治中手段和目的的倒置。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7]“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8]360}等民心理论,为中国共产党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提供了价值遵循,也为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心之所向、政之所往,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展现广阔的前景,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赢得民心作为不竭动力密切相关^[9]。就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而言,以民心为牵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新时代的“民心”是现实的、“自下而上”的民意与民愿,与传统王权之下“自上而下”的统治合法性叙事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一方面,“民心”具有非抽象性,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规制着文化建设发展的价值趋向。在“民心”旗帜的导引下,新时代布局文化工作始终坚持以民之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为得民心之道。另一方面,“民心”关乎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知民情所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布局 and 开展文化工作时的价值依据,“应民意作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也正是在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文化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和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进而夯实了党的领导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

(三)民生:文化发展的价值旨归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资本导向型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民生为大”的民生导向型现代化。“民生为大”体现在以坚守人民立场为价值旨趣的科学化、系统化的价值诉求中。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全面小康社

会的建成,社会物质基础更加坚实引发的人的需要的阶段性变化,使得追求精神生活更加富足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而文化不仅关乎政治、经济,而且关乎民生,越来越成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关键维度。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6]310}新时代,文化成为满足高质量精神需要的思想资源,文化民生成为民生改善的关键领域,文化民生建设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尊重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合乎民心开展文化工作,还是推动人民生活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协调发展、弥合人民理想化的富足精神生活与现实精神生活丰富性不足之间的差距等等,关键在于以文化之力纾解民生之困、契合民生追求。

民生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价值旨归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0]857}?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始终坚守着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深刻回答了文化建设“为了谁”“受益谁”的重大问题。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7]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增进民生福祉是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根本目的。需要明确的是,不同历史时期,民生的具体内容和任务也有所不同,习近平文化思想出场语境的给定性决定了其以回应和解决当前文化领域与民生相关的突出问题为主。换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在贯彻“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11]的改革原则中,致力于通过文化领域的改革。诸如破解当前存在人的数字文化适应能力不足、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供弱需强”、农村文化建设相对薄弱等文化民生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程,以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协调发展中,推动人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成果的受益者和享有者。

二、亲民为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实践指向

作为与“体”相对应的哲学范畴，“用”必然要受“体”之规制。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中形而上的理论层面之“体”规定和制约着形而下的实践层面之“用”，并使之呈现为在以文新民中塑造文化主体、以文富民中顺应民心诉求、以文惠民中改善民生的实践指向。

（一）以文新民：发挥文化之力，塑造人民精神气质

文能新民在于文化具有“化人”的社会属性，文化化人在于以“德”为核心的人文之道教化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去民之旧者，使民更新。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富含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在实践层面上还注重发挥中华文化之力，提升国民素质、养护人民精神，以培养具有现代化思想、素质和能力的人民。

其一，注重发挥中华文化的塑造力，提升中国人民的素质。提升人民素质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发展的内在要求。但由于人与文化之间是主客体双向建构的关系，人民素质的提升不能仅仅依靠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实现，而要通过文化实现人的社会化来完成。一方面，人民群众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赋予自在自然以“人的形式”，从而创造了丰富的文化景观；另一方面，体现着人的特点和人的尺度的文化集聚并积淀为“社会遗传密码”^{[12]687}，反过来塑造着人和人类社会。因而，作为特定文化存在物的人，要依靠不断发展的文化来满足精神生长性、变迁性、跃升性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深谙文化对人的影响，注重发挥文化对人的塑造作用。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尺度而非西方的价值尺度来塑造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7]推之于文化领域，这既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信，也宣示了中国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的坚定立场。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

注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塑造高素质的时代新人。社会素质结构受制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规范与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又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做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提供了新动力。

其二，注重激活中华文化的滋养力，养护人民精神。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文化不仅影响着中国人民的价值标准、行为选择，也构成了教诲人民道理、养护人民精神、筑牢人民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富含修身养性、治学为政等做人处事的真切道理；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事业的精神遗产，是厚植中国人民爱国情怀、英雄气概、牺牲精神等的红色资源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着中国人民精神发展的正确方向，三者共同筑牢了养护人民精神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尤为重视“三大文化”的作用，强调“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13]，要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14]。同时，还注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发展、以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赓续、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为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资源注入了动力，又为启民智、塑民魂，培养独立自主之精神主体提供了文化条件。

（二）以文富民：发展文化产业，满足民心诉求

文化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驱动力量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文化富民即通过文化经济化发展，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既富民之口袋，又富民之脑袋。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既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又能有效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文化富民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以实现文化富民的现实要求。

其一,注重打造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供给矩阵,不断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10]1012}用人民创造的文化满足人民发展着的文化需求,始终是我党的文化理想。当前,社会的加速变革、改革的持续推进、科技的飞速进步、财富的迅猛增长既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一改以往模仿型、排浪式的文化消费模式,个性化、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逐渐成为主流。但这一现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既有文化产品供给与当下文化产品消费的脱节与失衡,抑制文化产品价值的实现和文化需求的进一步释放。习近平文化思想锚定制约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问题,一方面,坚守文化产业发展的正确价值立场,摒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利益至上的全球渗透性霸权取向;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着力改变以往以供给端供给为主的文化发展模式,注重引导文化企业及时捕捉文化市场需求变化的信号,激发文化企业的创新力度,以新供给激发新的文化消费需求,进而实现高水平供给和高水平需求的动态平衡,不断提升人民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

其二,注重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数字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精神文化需要的有效途径和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文化思想也与时俱进地回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要求。首先,面对文化数字化发展新形势,“十四五”规划将“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作为重要内容,“十五五”规划强调推动人工智能同文化建设相结合。《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将“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作为8项重点任务之一,为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深入推进文化数字化战略,加快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实现文化进步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提供了保障。其次,尽管5G、3D打印、数字建模等技术手段

的运用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在云端构筑文化发展新高地,但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强调“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6]325},明确了数字文化产品要始终坚持内容为本,不断增强表现力和共情力的发展要求。再者,对于如何衡量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6]311}这意味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数字文化产业依然要坚持服务人民、合乎民心的导向,不断加大社会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力度、传播速度和覆盖广度,以增加社会精神文化资源存量,增殖人民精神财富。

(三)以文惠民:推进文化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互为支撑,但相较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注重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更加具有兜底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既重视发挥文化事业的保障功能,又具有以文化事业作用的发挥促进社会整体文明程度提升的实践吁求。

其一,注重增强文化事业保障能力,促进社会成员公平享有文化资源。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重要价值取向。但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间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失衡的问题。相比于城市居民,农民处于一种相对的“弱势”地位。马克思设想的在未来社会中“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2]689}依然是当代中国人民追求的目标。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发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相对匮乏的现状,反而有可能加剧城乡文化供给的不平衡。而习近平文化思想尤为关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15]314}。首先,针对农村文化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强调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给,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从公共文化

供给层面为保障农村地区农民基本文化权益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针对农村文化消费不足的问题,既通过多元方式促进农民增收,夯实农民文化消费的物质基础,又加大乡村文化建设投入力度,完善乡村文化设施,如建设乡村图书馆、乡村文化大舞台等,为农民创设良好的文化环境。通过大力发展具有公益性、公共性的文化事业,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权益和文化需要,促进了文化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

其二,注重以繁荣文化事业为契机,推动社会文明程度整体性提升。时代变迁中,生产力的进步客观上要求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而文化是“新民”的重要资源和塑造社会文明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建设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途径,文化事业因其非营利性和保障性而成为文化“新民”的重要抓手和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正值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契机,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要求深入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提升人民文明素养,而且坚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文化事业政策,因地制宜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尤其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推动文化资源更多地向乡村地区、欠发达地区倾斜,促进全社会文化资源的均衡发展。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诸如此类的文化实践,以整个社会为服务对象,不仅彰显了文化事业的性质,凝聚了价值认同,而且有效提升了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三、人民至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人学旨向

体用论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呈现“体”和“用”的二重性特征,揭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的差异性。尽管“体”“用”相异,但二者又相互联系、内在贯通,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之“体”与“用”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及其内蕴的人学旨向。

(一)立足现实的人:坚持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

现实的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现实的人的实践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关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的本质就是人自己”的认识,改变了旧唯物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分别将物、心、绝对精神、绝对理念作为本体的从人的外部寻求人的本质的错误认识,将人的本质从外物、从虚幻转向人自身、转向现实,揭示了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而劳动是现实的人的本质活动和人的存在方式,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区别于动物本能的适应自然,人则在理性的指导下,有意识地利用自然提供的生产资料,在改造自然创造新的生产资料以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中使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而创造出文化的世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对生产力的占有“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2]581}。因此,具有实践能力的现实的人是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文化生成不可忽视现实的人的主体性,需要让人民成为文化创新创造的本源力量。

现实的人及其文化创造的实践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在对具有实践能力的现实的人的进一步考察中,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观点,而且指出“人们在劳动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2]724},言明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在创造、生产着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口中那种“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的单个的孤立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文化的创造也是如此,不存在孤立的个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了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始终坚持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积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积极性、主动性,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人民性。

(二) 关注人的发展: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

人具有的发展本质,揭示了人的需要的层次性。马克思在揭示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的同时,指出人还具有反映人的生活更高追求的发展本质。首先,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的吃穿住喝的基本生存资料,以维持人的生命活动,解决人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其次,由于人的需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在生存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上,人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诸如在社会交往中获得尊重的社会需要、实现理想的精神需要等等。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持续性的需要生成和满足过程,在形式上呈现为“需要—被满足—新的需要”的波浪式前进的需要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95} 在旧的需要被满足和新需要的出场中,人类社会也获得了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

人民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是较物质需要更高层次的需要,关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也是精神存在物,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协同发展中推动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课题愈发凸显。立足于人民的切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论断,在此,“人民”限定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体,“精神”标定了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向度,“共同”界定了富裕的社会性质,实现了对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由少数人占有和享有富足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发展模式的超越。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坚守人民文化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将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

同富裕作为奋斗的目标,注重汇聚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力量,提升文化对人的发展本质的给养能力。

(三) 重视人的解放: 以文化进步推动人的自由和完善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是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表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将人的实践、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与文化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并通过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文化“不过是作为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其经济政治地位而创造的意识形态”^[16]的本质的揭示,高度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超越性及其作为一种人类解放的文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明确提出进行共产主义的“精神生产”,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实现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阶级立场和人民属性,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精神生产”有着一致的归根结底的目标追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肩负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以现代化的文化造就现代化的人的职责和使命。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总是处于一定文化背景中,受制于特定时期的文化环境的熏陶,并通过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取向体现出来。由人创造的文化也反过来推动着人不断挖掘自己的才能和潜力,开拓新的创造领域,文化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17]389}。文化越发展,人的知识越丰富、精神越自由,个性越能够得到充分的实现,人越有可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18]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始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不断推动文化进步、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全体人民素质、能力、境界的提升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又与时俱进地提出“第二个结合”“新的文化使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关乎新时代文化发展方向和趋势的重大创新论断,为全国各族人民坚定文化自信,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实现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文明复兴,进而以文化赋能人的解放和自由注入了强劲动力。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精髓,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的人民立场,为基于体用论的视域探析其内在的人民性特质提供了契机。但不同于中国哲学“体用之辩”中“本体”和“功用”的“体”“用”意涵,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的时空和语境下实现了对中国哲学中“体”“用”语义的创造性转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之“体”“用”更是紧紧聚焦于“人民”这一主题生发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贯通的理论维度与实践理路,并进一步揭示了其中蕴含的人民至上的人学旨向。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其价值在于“为实践发展提供新的思想指导和方向引领”^[19]。因而,当前要系统、完整地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持续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更好地谱写新时代文化发展的人民篇章。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人民日报,2023-10-09(1).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4]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存在

- 主义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5] 景怀斌,丁太平.“民心”的维度及政策——观念生成机制[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64-83.
-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9] 岳奎,吴敏.中国式现代化的民心逻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9):1-13+181.
-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 [12] 肖前,黄楠森,陈晏清,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 [13] 姜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N].人民日报,2017-01-07(1).
- [14] 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强调: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2-08-19(1).
- [1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6] 罗佳.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及其现代价值意蕴[J].学术研究,2023(11):39-46.
- [17]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18] 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求是,2019(12):4-12.
- [19] 郭慧慧,陆永胜.“同球共济”精神的文化逻辑与文明新形态意蕴[J].人文杂志,2025(9):11-19.

(责任编辑 光 翟)

美好生活视域下数字生活异化的审思与重构

吴 镒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 江苏扬州 225009)

[摘要] 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已全面重构人类生存方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剥离的生活底色。美好生活视域下数字生活的应然形态呈现三重维度:技术向善通过工具理性的人本化转向为美好数字生活提供技术支撑;人文关怀以情感联结与尊严维护为核心构成抵御数字异化的价值基石;治理创新依托技术规范与算法监管体系形成保障公平正义的制度框架。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逻辑正解构这一理想图景:数字联姻致使劳动幸福弱化、数字围困造成生活时空变构、数字附魅加剧精神家园失落。对此,美好生活理念为重构数字生活指明方向:通过扬弃异化重建劳动价值,以物质丰裕夯实生活基础;依托数字正义规范算法权力,重塑精神世界的自主性;发挥制度优势完善数据治理,保障全民数字权益,对实现数字时代美好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美好生活; 数字生活; 技术异化; 数字中国

[中图分类号] D6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3-0017-09

当今时代,数字生活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然深度融入美好生活的建构蓝图,成为衡量当代生活品质与社会发展的关键维度。然而,数字技术犹如一把“双刃剑”,在赋能社会活动、变革生活方式、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与正向影响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地产生种种数字生活的异化。我国正阔步迈向数字强国征程,全力推进数字技术与各领域深度融合,在此进程中,如何避开数字异化“暗礁”,使数字技术契合、增益美好生活愿景,已然跃升为备受瞩目的时代课题。鉴于此,从美好生活视域出发,重新审视数字技术与人类美好生活的关系,揭示数字生活异化的根源与实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认识与理解,更有助于开创独具中国特色、洋溢美

好意蕴的数字生活范式。

一、美好生活视域下数字生活的应然形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大力建设‘数字中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收获一批创新成果。分享经济、网络零售、移动支付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深刻改变了中国老百姓生活”^{[1]16}。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不仅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更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数字生活已然成为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好数字生活也成为建设“数字中国”的生动注脚与关键驱动力。从技术形态来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为支撑,构建起高效智能的生活场景,精准对接民众需求,极大地提升了生活的便捷性与智能化水

[收稿日期] 2025-10-20

[作者简介] 吴 镒,男,湖南岳阳人,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

平;从价值形态来看,美好数字生活倡导创新、共享、包容的数字文化价值,促进不同群体在数字空间的交流融合,赋予生活更丰富的精神内涵与人文关怀;而在制度形态方面,一系列围绕数字生活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不断完善,为数字生活的有序运行、数据安全以及权益保障筑牢根基。美好数字生活不仅是“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在民生领域的具象化呈现,映照出国家科技进步与创新发展给民众带来的切实福祉;更以其蓬勃发展的态势,不断催生新的产业模式、消费需求与社会生态,为“数字中国”的持续进阶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推动数字技术在更广阔的领域深度融入与拓展,进而全方位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与发展韧性。

(一)技术向善:美好数字生活的技术形态

技术向善发展与人民美好数字生活需要满足呈现辩证统一关系,即人民美好数字生活需要的满足要求数字技术形态向善发展,数字技术形态向善发展是人民美好数字生活需要的现实途径。数字技术只有坚持向善导向,才能突破资本逻辑对技术应用的扭曲,实现从技术统治到技术赋能的美好生活方式转换。

第一,技术向善是美好数字生活技术形态的必然要求。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进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9-10}。数字技术全面渗透社会生活肌理,推动产业升级,革新公共服务,优化社会治理,但也带来隐私泄露、算法偏见等潜在风险。技术向善理应成为美好数字生活中数字技术的本真形态,这不仅是基于数字技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更是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技术向善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数字技术的本质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非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在马克思那里,技术是生产力不可或缺的要

其特定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3],在美好数字生活里的技术形态应服务于人类的解放。从技术发展的脉络来看,数字技术自诞生之初便承载着拓展人类能力边界、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使命。当技术向善成为其主导理念时,数字技术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积极效能,避免因被不当利用而衍生出种种负面问题。在美好数字生活的构建中,技术向善意味着数字技术将始终以服务人类为核心宗旨,无论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助力提升生产效率、丰富产品供给,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为人们提供更加多元、优质的文化内容和便捷的交流互动平台,促进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都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导向,而非被资本逻辑所异化。另一方面,技术向善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效率的提升,但也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算法歧视、数据垄断等问题,实质上是数字资本逻辑的体现。技术向善通过伦理和道德的引导,有助于解决数字资本挟制下技术异化引发的社会问题,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推动社会公平正义。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好生活理念为实现数字技术向善提供思想指引。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好生活理念作为数字生活的核心指导思想,为数字技术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向提供了根本发展坐标,将数字技术伦理定位于“人的主体性”。对此,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57}技术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外化,本应成为确证主体创造性的载体,理想的、向善的技术发展应实现“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人在技术实践中不断突破既有界限,在创造新工具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超越,而非技术的附庸。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63}这一论断深刻表明,当技术回归本质,其价值坐标必然与人民需求同频共振。因此,必须根据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转变数字技术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构建满足人民美好数字生活需要的技术形态。当前,我国数字技术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但是,技术的胜利,如若“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使技术发展陷入“量质失衡”,则极易催生“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的异化危机^{[4]776}。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2]538}。此外,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到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健康”等理念的明确也势必意味着要求其赖以支撑的数字技术朝着“向善”的方向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的美好数字生活理念从根本上回答了数字技术发展的本体论问题:数字技术存在的意义或其应然形态不是征服自然、满足私欲或彰显权力,而是要服务于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尊严与发展。美好生活视域下的数字生活旨在要求数字技术“向善”发展,是实现物质力量与智慧生命辩证统一的价值必然,成为托举人民美好数字生活的坚实阶梯。

(二)人文关怀:美好数字生活的价值形态

在数字文明重构人类生存方式的进程中,人文关怀始终是抵御异化、守护主体价值的核心维度。当算法权力触角无处不在、资本逻辑催生数据垄断与数字鸿沟时,只有以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才能在技术发展中确立数字生活的文明标准。数字生活的本真状态是物质丰裕与精神富足的辩证统一,这要求我们在生产力跃迁中坚守人本价值立场,将数字技术的人文关怀嵌入美好数字生活,并使之成为其核心价值维度。

第一,技术异化中人性复归诉求的价值逻辑。数字化浪潮中,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的合谋正悄然重塑人类生存的底层结构。当算法推荐精准捕获用户注意力、数据垄断悄然侵蚀公共资源时,数字生活的异化困境已然昭示着纯粹工具理性的局限。人文关怀之所以构成

美好数字生活的价值内核,恰在于其能够穿透技术中立的表象,直面资本操控下的主体性危机。数字资本主义应用往往导致“业绩的主体”的诞生^{[5]71},个体在自我优化与自我剥削的循环中沦为数据流中工具性存在。这种异化既表现为平台经济对劳动时间的无限占有,又体现为数字资本通过“信息欲望”重构社会认知框架,使个体在虚拟平等的幻象中丧失批判能力^[6]。具体来看,算法权力通过情感计算与行为建模构建起隐形的规训网络,用户在享受个性化服务的表象下,其认知模式与价值判断正被数据画像悄然重塑。美好数字生活坚持以人文关怀为核心价值维度,不仅是抵御技术异化的价值屏障,更是数字文明存续的伦理根基。当数字化生存日益演变为代码化生存,只有将人的主体性置于技术架构的核心层,才能使数字交互摆脱工具理性的宰制,在虚实交融中守护人性尊严的完整性。

第二,伦理架构中人文基因觉醒的价值塑造。技术理性的膨胀在数字平台经济中呈现为“新型极权主义”:当点赞量异化为存在价值的度量衡、社交货币置换真实的情感联结时,技术中立的幻象掩盖着人的意义世界的持续坍塌^{[7]53}。人文关怀在此情境中承担着双重使命:既要解构算法霸权对数字生活世界的殖民,更需在数字化的本体论层面重构人技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和谐”“公正”等理念,正通过算法逻辑的共生性改造与数据治理的公平性嵌入,激活技术架构中被压抑的伦理基因。当共生理念成为算法推荐的底层伦理、当公平原则主导数据资源的分配正义,数字空间的演进便能在算力膨胀与人性坚守之间建立动态平衡,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生成与发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算法黑箱的透明化改造与用户尊严的算法化保障,标志着人文关怀从抽象理念向技术伦理基质的转化,将在数据殖民的废墟上重建属于人的美好数字家园。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美好数字生活的建构绝非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涉及社会关系根本变革的文明形态创新。当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与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便能够突破资本与技术合谋的窠臼,在物质生活升级与精神世界充盈的共振中,开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共鸣的文明新范式。社会主义数字文明价值形态的独特性在于,它既承继了中华文明“民惟邦本”的思想传统,又创造性转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崇高理想,最终在数字化生存的全球图景中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树立起以人文关怀为元伦理的数字文明路标,指引数字技术演进始终服务于现实的数字个人的自由个性。

(三) 治理创新:美好数字生活的制度形态

技术的进步应当服务于“现实的人”的解放需求,而非沦为遮蔽生产关系的异己力量。中国的数字化实践正通过制度性创新,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范式,从打破信息壁垒的公共数据平台,到保障算法透明性的监管框架,技术规范与人文精神的共振构建起美好数字时代的柔性基础设施。

第一,社会主义数字治理体系对数字异化的现实消解。资本主义数字治理的困境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数据要素社会化属性的根本矛盾,而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数据资源的公有化改造,重构了数字时代的治理根基。因此,美好数字生活制度形态中的治理创新的核心在于构建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机制,破解资本逻辑对数字技术的殖民化操控。从人类技术史维度考察人类生存与技术演进的规律,可以发现技术形态始终与特定生产方式相适应。农耕时代的灌溉技术服务于定居文明,工业革命以蒸汽机重构社会分工,而数字技术正推动“数智文明”的诞生。在此进程中,美好数字生活的本质要求是使数字生产力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正是适合资本的生产方式^{[8]775},但社会主义制度可通过生产关系调整,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建构工具。例如,我国通过公共数据平台建设与算法透明监管框架,将数据要素纳入国家

治理体系,既释放数字经济活力,又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社会主义数字治理体系通过顶层制度设计直接协调数据要素的社会化生产与个性化需求,从根本上遏制平台资本主义通过数据圈地形成的“数字利维坦”,超越了资本主义利润至上的治理逻辑,使数据资源从剥削工具转变为普惠性公共产品。

第二,美好数字生活算法伦理与数据正义的治理实践。美好数字生活治理创新在技术维度体现为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资本逻辑主导的算法往往加剧信息茧房与大数据杀熟,而数字中国建设通过算法备案审查与伦理评估制度,强制技术开发者嵌入公平性参数,如反歧视性推荐规则。以数字医疗领域为例,政府主导的智能诊疗系统通过数据脱敏与均衡采样,有效规避商业平台因利润导向导致的城乡医疗资源算法偏差。再例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立的跨省域政务数据共享平台通过“所有权归国家、开发权归联盟、收益权归民生”的机制创新,破解了数据流通的行政壁垒与利益藩篱。与此同时,美好生活视域下的数字治理创新不仅涉及技术改良,更需构建“法治—德治—共治”的三维规制体系:法治层面国家出台的《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算法开发、使用 and 监管的规范和要求;德治层面相关行业机构通过设置算法伦理委员会等措施加强培育算法开发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共治层面算法审计委员会的建立鼓励社会各行各业的公众共同参与数字治理^[9]。总之,美好数字生活的治理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治理工具创新实现了数据占有权的私有藩篱向数据使用权的公共转化,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2]148}。

二、美好生活视域下数字生活异化的实然症候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通过数字隔离、数字操控等手段对生活世界的不断侵蚀渗透,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对生活世界的宰制。美好生活理念的提出可视作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生活异化现象的

一种批判性对话,通过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揭示数字生活异化的根源与实质,进而在本土语境中探索契合自身文化、社会肌理的数字生活重构路径。

(一)数字联姻:劳动幸福的弱化

马克思的思想理论跨越时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适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和扩展。在对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精辟地揭示了异化劳动带给劳动者异己性的心理体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不再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4]53}。这种异化了的劳动导致劳动者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遭受剥削,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和享受。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本质,数字与资本的“联姻”反而在某些方面加剧了劳动者的被剥削和异化。数字技术的发展虽然表面上为劳动者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个性表达的空间,但实际上,这种自由本质上是被资本家通过数字监控和算法控制所掩盖的另类剥削。

究其缘由,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剥削具有隐蔽性。资本与数字的结合通过模糊生产与生活的界限,借助为资本家独占的数字生产资料——大数据平台的控制,实现对劳动者的全方位监视。在资本控制的数字系统中,不仅监控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还监控他们的个人数据和行为模式,从而进一步剥夺了劳动者对自身劳动的控制权。此外,数字资本主义促使传统雇佣劳动向平台经济转变,劳动者作为平台上的“玩工”或“用户”,社交媒体内容创作、在线游戏参与等隐性数字劳动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更为隐秘的手段。数字系统向生活世界侵袭日益扩张和复杂化的直接后果,便是人们更加依赖于借助数字技术、智能算法以应对纷繁多变的复杂事务,在日用而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数字系统的宰制。

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剥削具有欺骗性。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构建虚假的自由幻象欺骗劳动者,使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愿”接受剥削。数字技术辅佐下的新型劳

动模式使得工作时空与生活闲暇的边界更加模糊化,生活闲暇也成为资本增值的新空间。例如,零工经济中的“自由化”外衣实际上是一种劳动控制的手段,劳动者虽然表面上拥有时间自主掌控的感觉,但实际上仍受到平台的严格监控和控制^[10]。劳动者在平台公司的系统算法运转体系下,虽然看似拥有灵活的工作时间,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时间被延长到了身体和社会界限的极限值,在不断地奔波劳碌中加速剩余价值的创造。同时,这种欺骗性还体现在劳动者对自身处境的认知上,资本通过“进步力量”和“竞争逻辑”竭尽所能挖掘和利用主体潜能^[11],使得劳动者往往难以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剥削,当劳动者向生活发起诘难、对自身劳动价值进行质疑时,无意识中滑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思维陷阱,沦为劳动者的自我谴责或自我剥削,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的反抗意愿,从而陷入更深层次的异化状态。

(二)数字围困:生活时空的变构

在数字化社会中数字技术打破时空场景限制,个体被数字技术所包围,无法完全脱离数字环境,从而导致生活时空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在资本数字化与数字资本化交织而成的“密网”围困之下,“主体的人”感性的丰富性难逃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大数据行为追踪等智能算法而实施的三维立体式监控,个体的时间和空间感知力大幅削弱,无形中按照算法引诱的规范逻辑来支配自己的行为,乃至改变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造成心理时空、生活时空和社会时空的重构。

第一,心理时空的坍缩。数字技术的“围困”使得个体的心理时空受到挤压,导致时空紧张感、危机感和贫穷感的增加^[12]。个体自我在获得信息内容支配“自由”的同时,又陷入心理时空“被抛”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状态。沉浸于数字谄媚的个人丧失了原来生活赖以依存的意义,伴随着频繁地“打开、登录、点击、刷新”悄然流逝的时间的是自我意志空间的坍缩,不断将自身陷入现实生活世界的风险境地,不得不负担起更大的心理时空压力与

精神焦虑。

第二,现实时空的异化。数字场景的不断建构和多要素彼此作用引发的矛盾,使得个体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时空被加速和压缩,时间被分割成零碎状态,空间也被压缩和重构。从现实生活时间来看,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技术手段改变了传统时间结构,加速了社会的运行节奏,造成自然时间与数字时间的对立与冲突,包含劳动时间、闲暇时间、睡眠时间在内的各种现实生活自然时间不断地面临资本操控的数字化,为资本化的数字时间侵占、挤压,陷入“无时间之时间”的异化状态;从现实生活空间来看,数字资本主义打造的数字空间突破了现实空间的局限性,利用文字信息等一系列数字符号牵引现实的人逐渐加深对虚拟空间的依赖并与现实空间相疏离,个体处于虚拟空间全天候在场与现实空间间歇性宕机的颠覆、虚拟空间扎根与现实空间无根的倒置,不断剥夺“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13],不断削弱“现实的人”的生存厚度与生命意义。

第三,社会时空的紊乱。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运行的逻辑,重塑了人类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导致社会时空秩序的瓦解和人际链接断裂的加剧。数字资本主义冲击着传统熟人社会加剧转变为陌生人社会,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淡漠化和虚拟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信任危机扩大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日益被暂时性的利益或兴趣合作关系所代替^{[14]135},如流行于青年群体中的“搭子文化”,“饭搭子”“运动搭子”之间的泛泛之交,情感联系变得脆弱和表面化,缺乏深厚的情感交流和深入的社会支持,难以建立深层次的信任,长此以往将造成人际关系的疏远和社会冲突的增加,加剧社会时空的分裂与隔阂,阻碍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和谐发展。

(三)数字附魅:精神家园的失落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触角利用数字技术进一步延伸至人类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并对其加以附魅和布控,造成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

数字异化造成个体精神家园失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虚假的精神需求。在数字消费时代里,个体需求和精神价值取向完全被数字资本全面占优的消费所控制,不断滑向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深渊。数字技术与资本的耦合打破了传统消费的限制,触手可及的消费平台搭载为个体量身定制而精准推送的消费内容,不断刺激和放大个体的消费欲望,进一步剥夺个体对自身消费能力以及消费必要性的感知力,将个体的精神需求与物质消费紧密捆绑,通过购买商品和体验服务来寻求低级的精神胜利法。以“声誉消费”“符号消费”为典型的消费行为逐渐脱离实际需求,个体“一味满足于‘虚假的需求’,却从未反思过‘需求的虚假’”^{[14]116}。其二,媚俗的精神文化。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资本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算法和数据平台通过私人定制的文化内容和精心架构的文化生态,倾向于生产那些易于消费、制作成本低且能够迅速吸引大量用户的“爆款”内容,导致各种媚俗化、娱乐化和浅表化的大众文化泛滥,而数字技术也为文化信息传递的质量控制和筛选机制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大众在对普遍性的接纳与认同中迷失自我,精神生活变得越来越浅尝辄止和游移不定^{[14]115}。例如在年轻人群中广泛流行的虚拟偶像文化,便是以数字技术提供技术支持和传播载体的一种新兴亚文化。虚拟偶像的完美人设和拟真形象极易引发年轻人的情感依赖和价值异化,导致青年群体在情感上过度投入,甚至出现伦理失范现象。与此同时,各种丧失精神意义深度的数字文化的圈层化发展也加剧了信息茧房化和群体极化的风险,使得青年群体在虚拟空间中越来越脱离现实社会。其三,迷失的精神自我。在数字资本主义的逻辑下,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同时个体的自主性和个性也逐渐被资本赋予的数字“魅力”侵蚀和消解。人本应以纯粹的美的尺度自由地实现并确证人的类本质和个性,个体的内在尺度与数字世界互动时,理应通过自我意识的提升和个性的独特表达实现精神升华

和自我超越。而现实情况却是人的自由本质和个性消解在了数字附魅的过程中,逐渐遗忘了人自身作为类存在区别于动物所固有的、独特的超越本性。

三、美好生活视域下数字生活重构的使然路径

面对资本与数字的合谋,我们的生活该如何在汹涌的浪潮中找到平衡与方向?美好生活理念的提出本质上承载着人民生存、生活应然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内在地、固有地指涉着公平、正义、平等、和谐等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美好生活理念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异化予以理论批判,积极还原生活本来面目,而且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中呈现的数字生活异化现象展开现实斗争提供了精神指引和行动指南。

(一) 扬弃数字异化,构建美好物质生活

美好数字生活的构建,物质生活是基础。数字异化在物质生活领域的突出表现,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的异化逻辑^{[8]828},可以看出,数字时代的生产资料数字化并未改变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本质,实质都是数字泰勒制的当代演绎。因此,扬弃数字异化,摆脱数字资本逻辑束缚是构建美好物质生活的破解之道。数字资本逻辑大体可以概括为数字资本的逐利性、数字资源的排他性和数字技术的操控性。因而,挣脱数字资本逻辑桎梏,需要从其对立面出发,秉持构建美好物质生活的核心理念,对数字异化进行批判性超越,促使数字技术复归其本质功能,还原为服务于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本真状态,重新审视数字技术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应用路径和在塑造劳动者的存在方式上的价值定位。

第一,以数字生活人本原则消解数字资本的逐利性,优化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数字技术的发展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物质生活需要。在物质资料生产环节,数字资本为追求高额利润,过度集中于高附加值、高利润的数字产品生产,如高端电

子产品或某些高收益的数字服务,而忽视了大众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相关的数字生产领域,导致数字资料物质生产结构失衡,部分基础数字产品供应不足或供给质量低下。基于数字生活人本原则,我们应引导数字资本投向更广泛的物质生产领域,特别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数字产品制造和数字服务供应,通过智能化生产系统,利用数据分析预测市场需求,指导生产,优化数字资源配置,避免数字产品过剩或短缺,实现物质资料的高效生产和分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物质需求,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大众物质生活。

第二,以数字生活共享原则化解数字资源的排他性,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数字资源中海量数据来源的公共性质决定了其不应为资本私人占有,部分关键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被少数企业或机构垄断,阻碍了物质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创新发展。从数字生活共享原则出发,我们应推动建立公共数字资源平台和开放的数据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壁垒,实现数字资源的透明化和公有化,推动企业打破数字资源的排他壁垒,提高弱势群体的数字接入能力,实现数字资源在物质生产中的高效流通和公平分配。

第三,以数字生活自主原则破除数字技术的操控性,提升物质生活的自主创造性。资本联合数字技术的操控性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的自主创造性被剥夺。在生产端,必须强化平台社会责任意识,提高数据使用的透明化和合规化,明确告知劳动者在数字平台从事生产活动中收集的数据类型、用途和存储方式,优化平台任务设计与管理,建立劳动者反馈机制,保障劳动者数据访问和控制的权限,尊重和保护数字劳动者的权益和尊严;在消费端,政府监管部门应联合行业协会,制定严格的数字消费平台准入和运营规则,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规范数字产品信息披露机制,防止算法过度引导和虚假消费评价泛滥,保障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使数字技术在物质生活中得以合理运用,促进美好物质生活的构建。

（二）坚持数字正义，重塑美好精神生活

如何使现代人走出虚假需求与生命意义的错位失衡、文化荼毒与审美超越的纠葛困厄、数字他者与精神自我的交融冲突，真正实现精神生活的文化自觉和自我体认，这是数字时代构建美好精神生活世界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坚持数字正义，以道德理性消解工具理性，平衡数字技术张力，实现数字技术向善，是重塑美好精神生活的必由之路。

第一，以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澄明数字生活精神迷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智慧与道德意蕴，为我们提供了批判性审视数字生活、重塑精神主体性的宝贵资源。一方面，坚持以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引领数字生活的发展方向。面对数字生活中个体自我选择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丧失，我们应保持高度的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借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智慧、传统美德和艺术审美形塑正确的数字技术观念，在数字洪流中保持清醒的认识，唤醒精神生活的主体意识，以确保数字技术的发展服务于人类的精神需求，而不是走向人自身的背离，甚至是自我割裂。例如，传统文化中的“修身”理念可为数字时代的精神迷失提供解药，通过德行约束个体欲望，引导网民从“私民”转向“公民”^[15]。另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丰富的优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出更多有思想深度、有文化内涵、有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打造高质量的数字网络空间，为数字生活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底蕴。

第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数字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在数字公共领域中，资本裹挟数字技术的全景式布控使得人们的精神生活在各种思想文化激荡、价值观念冲突和社会舆论交锋中日益走向灵魂漂泊、生命意义的缺失乃至精神家园的失落。在数字交往过程中数字空间的虚拟性、隐匿性也导致数字话语权弥散，主流话语权威遭受排挤和削弱，进一步加剧精神生活危机。净化数字空间生态环境，

形成数字化精神生活文明新风尚，亟须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数字网络空间的话语权，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价值导向和价值规范引领和调节数字生活情境中的价值取向，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积极、包容与和谐。例如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数字平台内容审核、过滤、推荐机制建设。一方面，加强数字内容创作生产传播的源头治理，积极引导各数字平台建立价值导向奖惩机制，鼓励创作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质内容。另一方面，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智能分发和定向操控，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识别，精准洞察不同社会群体思想动态、兴趣偏好和信息获取习惯实施个性化推荐和分众化传播，使主流价值观成为数字生活交往空间的主导力量。

（三）发挥制度优势，保障人民数字权益

重塑美好数字生活方式，既要坚持美好物质生活与美好精神生活的一体化推进，也要将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完善数字制度，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数字生活建设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人民群众在数字生活领域中的合法权利与正当利益。

第一，数字权益保护机制的深化与优化。近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及《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的出台和完善，我国在保护公众数字权益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人民在数字时代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然而，“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但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时间差、空白区”^{[2]382-383}。例如算法解释、深度伪造、跨境数据流动等数字领域的界定和保护尚不明确，无法完全适应数字生活时代的发展需求，需要进一步提升法律规制效能，充分全面地实现公众数字权利配置^[16]，健全数字权益保护及其

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数字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

第二,数字监管实施机制的强化与整合。一方面,执法部门要加大数字生活领域的执法力度和监管强度,严厉打击数据侵权、直播带货侵权假冒等违法行为,提高违法成本。与此同时,执法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应提高对新技术、新业态的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掌握相关前沿信息和技术手段,深入了解可能的风险隐患,准确识别潜在的违法违规行爲,提高执法能力。另一方面,整合社会资源,设立跨部门的数字监管协调委员会,统筹协调网信、工信、公安、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相关部门的数字治理能力,鼓励学校、社区、企业、公众参与数字监管工作,形成政府主导、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协同监管合力。

第三,数字公共服务机制的完善与创新。政务部门要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利用数字技术简化服务流程,提升数字公共服务效能;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数字公共服务建设,推动数字公共服务项目落地实施;强化衣食住行、科教文卫等民生领域公共服务资源的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推进构建智慧共享的数字生活;完善多层级、多维度的数字服务体系,强化未成年人的数字网络规范教育,开展老年人群的数字素养提升志愿服务活动,弥合不同社会群体的数字鸿沟,共享数字时代红利。

总之,美好生活视域下数字生活异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抑制还是鼓励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在于数字技术为谁用和怎么用的问题。构建美好数字生活,既不能陷入“技术悲观主义”的窠臼,也不能沉湎于“技术乐观主义”的狂欢,必须始终坚持数字技术以人为本、为人所用的基本原则,牢牢把握数字技术的属人性,摒弃数字资本的逐利性,将数字技术规范置于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制度设计之中,使数字技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良序运行,以美好数字生活推动美好数字中国建设。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3] 刘日明.马克思的现代技术之思[J].学术月刊,2020(4):23-34.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M].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 [6] 周露平.美好数字生活的反思与建构[J].学术论坛,2024(1):100-109.
- [7]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 张龙.数字正义、算法伦理与美好生活:“数字中国”建设的逻辑体系[J].湖南社会科学,2024(5):23-30.
- [10] 严宇琨,龚晓莺.零工经济劳动自由剥夺的实质及应对[J].北京社会科学,2022(12):71-79.
- [11] 高天驹.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数字时代下异化劳动的新表现[J].天府新论,2021(5):33-40.
- [12] 管其平.大数据时代数字化生存的时空嬗变及其时空稀缺[J].深圳社会科学,2022(1):63-71+83.
- [13] 赵小敏,何玲玲.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异化及其扬弃[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64-75.
- [14] 庞立生.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生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15] 袁爱清,吴思嘉.技术与美好生活:数字化生存的困境及其超越[J].理论导刊,2022(8):84-90.
- [16] 周尚君,罗有成.数字正义论: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J].社会科学,2022(6):166-177.

(责任编辑 光 翟)